

# 《水浒》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吗？

苏化 高永康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可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却把美化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水浒》，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把这部反现实主义的作品，捧为“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最伟大的杰作”，说它“继承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而又在现实主义艺术发展上开创了长篇小说的道路”，等等。一个作家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直接影响着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特别是现实主义，是文学发展史上最基本的一种潮流和倾向，影响比较深远，是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一种基本方法。把《水浒》吹捧为现实主义的杰作，正是为了肯定它在思想上的成就。因此，剖析一下《水浒》，看它是不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对于认识《水浒》美化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是大有帮助的。

## 一、是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还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

对于什么是现实主义，革命导师恩格斯在总结文艺创作的历史经验时早就明确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典型环境问题。所谓典型环境，是指能够充分体现时代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向的环境，也就是恩格斯在别的文章里讲到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作品中主要人物“所处的历史潮流”和“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必须真实地、正确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本质特点，“表现哪个阶级成了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

《水浒》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按现实主义文学的要求，它应该描写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关系，以及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歌颂农民起义；但《水浒》却完全歪曲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恶毒地咒骂、反对农民起义。过去的一些评论者硬说《水浒》的“艺术描写是交织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并由此引出了《水浒》是“现实主义杰作”的结论。这是毫无根据的。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尤其是宋徽宗赵佶和他宠用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当政的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黑暗统治时期。宋徽宗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享乐，大兴“花石纲”之役，恣意掠夺和役使人民，使

广大劳动人民痛苦不堪。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在与西夏、辽国贵族集团的战争中，奉行妥协投降政策，屈辱求和，每年“以百万计”的银、绢送给西夏、辽国的统治者，用人民的血汗来换取朝廷的苟安。广大劳动人民则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水浒》作者不是尊重历史事实，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站在当时革命人民的立场上，揭露腐朽的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揭露它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写出现实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而是把赵宋王朝黑暗统治描写成“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的“太平盛世”。并且通过宋江之口，把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赵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宋徽宗，极力美化成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者，是“至圣至明”、“与民同乐”、“爱民如恐不及”的“圣君”。在这样的“圣君”统治下，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还存在什么利害冲突呢？被压迫人民还有什么起义、造反的必要呢？这样，《水浒》的作者就巧妙地掩盖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从根本上否认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从这里出发，《水浒》作者在描写梁山农民起义时，也就必然要掩盖这次起义的真正原因。在作者的笔下，上梁山的许多人，不是因为赌博输了钱，就是因为做生意折了本；或者是因为“至圣至明”的宋徽宗暂时“被奸臣闭塞”，使有的人想捞个“封妻荫子”而不可得，只好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途径，上了梁山；而更多的人，则是为了报个人的恩怨而上山的。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一指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北宋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把他们推入苦难的深渊，才迫使他们奋起反抗。方腊起义时，就曾义正词严地控诉以宋朝皇帝为头子的大地主阶级，指出：“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他大声疾呼：“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花石之扰，尤所弗堪”，号召农民们“仗义而起”。梁山农民起义，也是因为宋王朝把梁山泊收为官有，勒令渔民“立租算钱纳直”，他们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剥削压迫，才进行武装反抗的。可是，《水浒》对此却一字不提，更丝毫没有提到革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宣和遗事》里，梁山的三十六人中，杨志、李进义等十二人都是与花石纲有关的，但因为花石纲是赵佶直接施行的暴政，《水浒》作者就避而不写了。

一部《水浒》不揭露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写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斗争，而把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歪曲为“忠”与“奸”的矛盾，写所谓“奸逼忠反”，把宋江、皇帝与农民作为矛盾的一方，把高俅一伙“奸臣”作为矛盾的另一方，自始至终都把宋江同高俅一伙的斗争作为全书的主要矛盾来写。这就掩盖了宋江、皇帝与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的本质，也掩盖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尖锐的对立和斗争，歪曲了北宋末年现实的阶级关系。

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不仅要真实地、正确地描写现实的阶级关系，还必须写出历史发展的趋向。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水浒》作者如果真的采用现实主义的

创作方法，追求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就应该满腔热情地歌颂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歌颂这种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样才能正确地写出历史发展的趋向。可是，《水浒》不是歌颂农民起义，而是歌颂宿元景的反革命“招抚”路线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即如何内外配合用“软刀子”剿杀农民革命，使之“去邪归正”。在《水浒》中，作者写了两种“邪”，一是以高俅等人代表的“奸臣”、“贪官”，一是以晁盖为首的坚定革命派。前者，是通过“招抚”路线的胜利，宋江、高俅的合流，使之达到“去邪归正”的；而后者，则是通过宋江在起义军内部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变农民起义军为大宋皇帝的“御林军”，使之“去邪归正”的。

《水浒》作者极力美化宋江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作为农民起义的主导思想来写，把接受招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作为农民起义的必然归宿来写，这就完全歪曲了北宋时期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真实历史。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代，已经进入后期，一方面是封建专制主义大大加强，另一方面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更加激化，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建立“大蜀”农民政权，到方腊起义提出“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的战斗纲领，都具有鲜明的反对皇帝及其封建统治，建立农民政权的色彩。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的表现，因此，农民起义是不能不反皇帝这个地主阶级总代表的。

反招安，反投降，也是宋代农民起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只有坚持反招安，反投降，才能真正打击封建统治阶级，推动历史发展。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在描写农民起义时，就应该歌颂农民起义军反招安、反投降的革命斗争。而《水浒》的作者却拼命鼓吹“农民起义为招安”，这就完全歪曲了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

在《水浒》这部书中，也写了李逵、吴用、三阮等反对招安的行动，但是，这只是作为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陪衬。在作者笔下，李逵等人坚持造反、反对招安的行动是“可笑的”，“愚蠢的”，是一种“邪”，最后都屈从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接受招安，终于“去邪归正”了。更有甚者，作者还丑化方腊的革命道路，以方腊起义的失败来反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宣扬宋江投降有理，封“侯”成“神”，方腊造反有罪，“当刑受劓”。

总之，一部《水浒》，美化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掩盖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歌颂投降主义路线，歪曲了北宋末年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向，它描写的环境是不典型的，是反现实主义的。

## 二、是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还是美化垂死阶级的代表人物？

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论述，核心是要写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要通过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来反映时代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向。“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在文学史上，现实主

义作品之所以能在一定的高度上反映时代的本质，也正因为它歌颂了革命的、进步的人物，正确地表现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时曾指出：“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5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拉萨尔的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时候，批判了拉萨尔从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和机会主义立场出发，不去表现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而是“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的错误。拉萨尔美化、歌颂垂死阶级的代表济金根，把这个即将死亡的封建骑士，硬写成“革命领袖”，这就完全掩盖了济金根的阶级实质，歪曲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向。所以，拉萨尔的济金根绝不能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违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

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和拉萨尔的评论来剖析《水浒》，就不难看出《水浒》在人物塑造上也同样表现出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

作为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如果它的作者是现实主义作家的话，要真实地、正确地描写现实的阶级关系及历史发展的趋向，就应该满腔热情地歌颂农民革命英雄，揭露、批判混进农民起义军中的投降派。因为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可是，《水浒》的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拼命丑化真正的农民革命英雄李逵、吴用、三阮等，竭力歌颂投降派宋江，把这个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把这个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蛀虫、奴才和刽子手当作英雄来描写。这同拉萨尔的《济金根》歪曲人民群众，美化封建贵族是一致的。

既要把投降派宋江描写成“农民革命的领袖”，《水浒》的作者就不得不给宋江乔装打扮一番。一方面，把他作为高俅的对立面来写，打扮成反“贪官”、反“奸臣”的英雄，以掩盖“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的实质。另一方面，又给他戴上“及时雨”的桂冠，把他打扮成使梁山泊农民起义兴旺发达的当然领袖。然而，贴上假商标是为推销真货色。作者的意图是要宣扬统治阶级的“招抚”路线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为封建统治者绞杀农民革命献策。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又必须通过主要人物宋江的形象来体现，这样，宋江这个投降派和他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就不能不暴露在读者的面前。宋江上山之前，把农民起义的革命行动咒骂成是“犯了迷天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上山后，更疯狂地散布投降主义思想，招降纳叛，打击真正的革命派，组成“替天行道”的黑班底，积极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投降后，凶相毕露，就去打方腊。宋江的这一系列贩卖活动，使一些把《水浒》捧为“现实主义杰作”的评论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把宋江说成是一个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吧，他的投降派嘴脸又跃然纸上；承认宋江是投降派吧，又推翻了

《水浒》是“现实主义的杰作”的结论。怎么办？一些评论者于是根据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搬出典型人物的所谓“二重性”以弥合自己理论上的破绽，并对农民阶级的阶级本质加以歪曲。他们说什么“宋江主要是代表农民革命思想的领袖，农民思想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宋江是一面想到招安，一面组织了许多革命英雄，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农民革命队伍的”。总之，是要读者相信宋江的性格是复杂的，他具有“双重人格”（即“二重性”），他是一位领导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而不是投降派。

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是不符合作品的艺术描写实际。《水浒》里的宋江，实际上是一个披着“江湖义士”外衣，带着“曲线尽忠”的反革命计划，打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的黑幡，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一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出卖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业的无耻叛徒和内奸。他的人格只有一个，那就是仇恨人民，反对革命。其次，把宋江说成是“一面想到招安”的投降派，又同时是建立农民起义军的革命领袖，即把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统一在一个人物的身上，这无疑唯心主义的“二元论”、超阶级的“人性论”、抹煞矛盾斗争的“合二而一”论在艺术典型问题上的恶劣表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这里，有必要对以“二重性”评论宋江的问题多讲几句话。“二重性”或叫“双重人格”的典型理论，在我国文艺界从三十年代起，就一直是为叛徒辩护的一种反动典型学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从敌对的两个阶级的人物身上去寻找所谓的“共同人性”，鼓吹坏人身上也有“优点”，好人身上也有“缺陷”，有的人甚至胡说这才是“现实主义的深化”。三十年代对李秀成和赛金花的吹捧，五十年代对葛利高里、索科洛夫和宋江的赞颂，六十年代对“写中间人物”的宣扬，都是以这个反动的、反现实主义的典型学说作为立论的理论依据的。这个理论的产生和泛滥，完全是为了适应政治上的投降叛卖活动的需要。它的鼓吹者们，妄图把叛徒和其他各类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人物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混同起来，在文艺作品中美化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丑化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最终混淆革命同反革命的界限，掩盖现实的阶级关系，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以便宣传投降主义路线。

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文艺作品中的所谓理想人物，其性格有无分裂、矛盾的现象呢？当然有的。但是，这并不是什么“双重人格”，不是什么革命性格同反革命性格的“合二而一”，而是地主资产阶级文艺家美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性格特点。这类人物，革命是假，反革命是真，常常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这类作品的炮制者们，站在歌颂反革命两面派的立场，把伪装写成本质，把反动说成革命，必然造出一种虚假的典型。宋江就是一个虚假的艺术形象。《水浒》的作者，竭力把维护封建制度、“替天行道”的“忠臣”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美化为梁山农民起义的唯一正确的领袖，即把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描写成农民起义军的革命领袖的形象。显然，作者塑造宋江这个人物，不是从现实的关系出发，完全是凭自己的反动政治理想来任意加以涂抹。这样的虚假人物，自然就不可能反映出它的阶级本质，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向，不能表现一定的典型环境。象这样的虚假典型，还有什么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可言呢？我们评论《水浒》的正确立场和态度，是要揭露宋江形象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揭露作者美

化这个投降派的反动实质，而不能象有些评论者所做的那样，用“二重性”的反动理论去为之辩护，硬要从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去找他的所谓“革命性”，甚至说这种“革命性”还是他性格的主导面，把反革命两面派打扮成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从而把反现实主义的毒草吹捧为现实主义的杰作。

在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水浒》作者为了美化宋江，还对真正的农民起义革命派不惜加以嘲笑和丑化。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和丑化李逵，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可是，过去的一些评论者不研究作者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却以鲁智深、武松、李逵为例，说《水浒》作者“公开地赞扬、歌颂农民起义和起义的英雄们”，并称“这是《水浒》现实主义艺术的最大特色”。这其实是硬派给《水浒》作者的。

翻开《水浒》，我们从书中虽然可以看出李逵等人的反抗斗争，但作者丝毫没有赞扬、歌颂的意思。相反，作者总是嘲笑、丑化他们的革命行动。就李逵来说，从外貌到言行，都遭到了丑化。他被描写成好吃酒，好赌，莽撞，急躁，不讲策略，乱砍乱杀的“黑旋风”。作者是把李逵的一生作为“去邪归正”的一生来描写的。在作者看来，李逵的“反性”是一种“邪”，写李逵的“反性”，正是为了突出宋江对赵宋王朝的“忠诚”，是为了写宋江怎样用“替天行道”的黑幡招引李逵等人“去邪归正”。因此，在写到李逵等人反对宋江投降的斗争时，结局总是李逵“喏喏连声”的认错或出尽洋相而引起哄堂大笑；而宋江呢，他鼓吹招安，乞求投降，总是博得“众皆称谢不已”。在这里，《水浒》作者美化投降派宋江，把他打扮成众望所归的“盖世英雄”，丑化农民起义军中最坚定的革命派李逵，不是昭然若揭吗？作者这样来描写，无疑是对中国农民革命史的严重歪曲。在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上，“**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黄巢狠揍投降派王仙芝，杨么痛骂叛徒杨华就是很好的例证。

总之，作者根据他的反动政治理想来塑造人物，让人物的活动变成他反动政治理想的图解，使他的人物的动机不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而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得来。这正是反现实主义的一个特点。作者写李逵的“反性”，是为了写“去邪归正”；写李逵对宋江的“忠诚”，尽义于宋江，也是为了麻痹人民，让李逵这样的真正的农民革命派跟着宋江投降（“去邪归正”）。但是，过去有的评论者，在评价李逵的形象时，看不清作者写李逵的“反性”是为了写“去邪归正”的反动实质，把作者对李逵形象的丑化当作是对李逵的歌颂，并由此得出了“这是《水浒》现实主义艺术的最大特色”的错误结论。同时，他们又不能正确地解释作者为什么要突出写李逵对宋江的“忠诚”，因而和评价宋江一样，也搬出了典型人物的“二重性”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同现实主义的典型性格学说根本对立的。

### 三、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

一个作家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归根结底是由他的世界观所决定的。无产阶级以前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指导思想，都是以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伟大现实主义成就的同时，总是肯定了他世界观上的积极的、进步的方面。马克思赞赏巴尔扎克“**在深刻理解现实关系上总是极其出色**

的”；恩格斯也肯定了巴尔扎克“看到了”贵族必然灭亡和共和党人代表着未来这一现实关系，从而讽刺嘲笑了贵族和赞赏了共和党人。巴尔扎克如果没有这两个“看到了”引起的世界观的改变，就不可能取得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水浒》表现出的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也正是由于它的作者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立场上来认识生活和塑造典型所造成的。

关于《水浒》作者的资料很少，要从他一生的活动来考察他的世界观是困难的。但是，从《水浒》这部书的艺术描写来看，我们仍然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作者唯心主义的反动创作思想。

翻开《水浒》，里面充满了孔孟之道及其在宋代的变种——程朱理学。诸如什么“存天理，灭人欲”，唯心论的“天命论”，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孔孟的“中庸之道”，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忠义”，等等。《水浒》的作者运用这些唯心主义观点来考察社会历史，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于是在作品中歪曲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歌颂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毛主席在批判《武训传》时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水浒》的作者正是这样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下面，我们还是从环境的描写和人物的塑造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水浒》作者的创作思想。

《水浒》的作者以孔孟的“天命观”和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思想作为设置作品矛盾冲突的理论根据，以“忠义”者与不“忠义”者（即“忠”与“奸”）的斗争为贯穿全书的主要矛盾，用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和孔孟的“中庸之道”掩盖和调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从而歪曲北宋末年的社会现实。

《水浒》作者鼓吹“天命”，鼓吹“君权神授”，把宋朝皇帝说成是“神仙下凡”，使百姓“一旦云开复见天”，把北宋王朝描绘成“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的“太平盛世”。只是由于出现了瘟疫，仁宗皇帝派洪太尉请张天师祈禳，“误走妖魔”使一百零八座天罡、地煞星下凡，才引出了梁山泊故事。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个“魔星”，是按照老天的意志下凡历劫的。最后都在“替天行道”的黑旗下投降了宋王朝，“去邪归正”，“方成正果”。

马克思说：“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水浒》作者从“天命论”、“天道循环”的唯心史观出发，编造出这种荒诞的故事，把梁山农民起义归之于“天意”，把接受招安、投降说成是“天理”，抹煞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的对立，掩盖以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罪行，歪曲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

《水浒》以“忠义”者与“不忠义”者（即忠与奸）的斗争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矛盾。即以“奸”逼“忠”反为开端，以宋江同高俅的“对立”为主线，以宋江等人“全忠尽义”为结束。在作者笔下，宋朝皇帝是“至圣至明”的，只因被高俅一伙奸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使宋江一类“忠臣”“虽有忠心，不得进步”，“奸逼

忠反”。只要效忠皇帝，依靠忠臣，反对贪官，就能使天下太平。这实际上是用“忠”与“奸”这种地主阶级内部小狗与大狗、饿狗与饱狗的斗争来掩盖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对立，把农民起义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反对“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封建统治者”，“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水浒》的作者还鼓吹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和孔孟的“中庸之道”。正是在“冤仇可解不可结”，“我等忠义自守，以强欺弱，非所欲也”等借口下，宋江大搞招降纳叛，把“帝子神孙”，“富豪将吏”拉上梁山，调和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同时，还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地主阶级“人性论”，并在七十一回一篇“单道梁山泊好处”的“言语”中，给人们描绘了一幅“中和”世界的理想图，掩盖和调和起义军内部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

不难看出，《水浒》作者在唯心史观指导下，歪曲了北宋末年的阶级关系和历史发展趋向，没有真实地再现北宋末年的典型环境，是直接违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

《水浒》作者的唯心史观反映在人物塑造上，就是一方面把宋江写成“忠义”的化身，写成地主阶级和孔孟的“中庸之道”的典型；一方面又依靠神的力量，把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宋江打扮成农民起义的正确领袖，构成了一个虚假的人物形象。

在《水浒》作者笔下，宋江是“上应玉府”的“天魔星”，是“受命于天”的英雄，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是依靠上天的意志。他下凡是因为“魔心未断，道行未完”，玉皇大帝才把他“暂罚下方”。他抛出“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纲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是按照九天玄女的“法旨”；他“权借梁山泊避难，专待朝庭招安”，以后充当镇压方腊起义的刽子手，最后封侯成神，也都是老天的意志。作者就是这样，依靠神的力量，把投降派打扮成农民起义军的“正确”领袖，把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捏合在一起，掩盖宋江的地主阶级实质，给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涂上一层神的灵光。只要剥开这层神的灵光，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宋江不是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典型，而是投降派的典型。他的一切言论行动，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性格特点，决不是神的安排，不应从“神”那儿去找，而应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中去找。宋江的性格是特定的阶级斗争中的一种表现，是由北宋末年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水浒》作者从唯心史观出发，当然要采取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掩盖宋江的动机产生的真正社会原因，塑造出一个虚假的典型形象。

从上面三个方面的简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水浒》不是什么“现实主义的杰作”，而是歪曲农民起义、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美化投降派的反现实主义的一部反面教材。